

# 訂古當前傲世姿：論衛聚賢、孫次舟辨史 疑古之話語權競奪

周志煌\*

## 摘 要

衛聚賢、孫次舟分別為 1920 年代清華國學研究院及北大國文系畢業學生，在民初歷史及考古結合的學術趨向中，兩人曾互相在對方主編之學術刊物發表文章。尤其在「疑古」思潮之下，衛、孫二人頗多奇說怪論引起當時學人側目，然迄今對二人論學及相關言說之研究仍未多見。究竟什麼樣的個人心理與學術氛圍促成了他們的治學趨向？他們的言說內容為何？二人為何要衝撞當時的知識場域？如何的挑戰其他學人的文化民族主義情懷？本文希冀透過相關報刊文獻及史料之抉發，討論二人相關話語內容及反映出的學術性格，辨析衛、孫被時人視為異端的論說，在民初知識話語競奪當中所能呈現之思想史意義。

關鍵詞：衛聚賢、孫次舟、傅斯年、顧頡剛、文化民族主義

---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Arrogance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On Wei Ju Xian and Sun Ci Zhou Competition on Discussing History and Skepticism of Antiquity for Discourse Rights**

Chou, Chih-Hu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Abstract**

Wei Ju Xian (1898-1990) graduated from the Tsinghua Academy of Chinese Learning, and Sun Ci Zhou (?-2000) gradua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Peking University in the 1920s. In the academic trend of combining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y published articles in journals edited by each other. Their bizarre theories were contempt by scholars during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skepticism of antiquity” time, so there has been little research on their theories and discourses. What individual psychology and academic atmosphere contributed to their academic tendency? What were their contents on discourses, and why did they collide with the field of knowledge at the time? How to challenge the cultural nationalism of other scholars?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discourse content and literary character of Wei and Sun via relevant publication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o analyz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ir theories that they regarded as heresies in the contest of intellectual discourse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Keywords:** Wei Ju Xian, Sun Ci Zhou, Fu Ssu Nien, Gu Jie Gang, Cultural Nationalism

# 訂古當前傲世姿：論衛聚賢、孫次舟辨史 疑古之話語權競奪\*

周志煌

## 一、前言

衛聚賢（1898-1990）、孫次舟（？-2000）二人，分別為 1920 年代清華國學研究院及北大國文系畢業之學生，在上個世紀 30、40 年代歷史及考古結合的學術氛圍之下，兩人著述除自家刊物及其他報章雜誌刊登外，也互相在對方創辦及主編之刊物（孫次舟主編《歷史與考古》；衛聚賢主編《說文月刊》）上發表文章。尤其在「疑古」思潮之下，兩人頗多奇說怪論引起當時學人之側目，諸如「墨子為印度人」、屈原為「弄臣」等，也因為此等奇說怪論而掀起諸多論戰。由於衛聚賢 1949 年以後離開大陸至香港，又於 1970 年代後期從香港至臺灣，於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任教，大陸學者對其 1949 年以後的學術動態相對陌生，近年來才稍有關注衛氏在 1949 年以前的學術表現。相對的，孫次舟亦因個人學術性格及政治因素，在 1949 年以後即使留在中國大陸，其早期的學術意見，除了偶有被提及 1944 年轟動一時以屈原為「弄臣」（聞一多喻之為「文化奴隸」）的奇說外，大概也鮮少有學者會注意到孫氏在國學方面的造詣。查之臺灣學術專書、碩博士及期刊論文，迄今無人以專文討論孫次舟，即使衛聚賢部分，專書及碩博論文亦付之闕如，期刊也是零星幾篇介紹性質的文章。臺灣如此，大陸學界亦復如是。兩人何以長期被學界埋沒及忽視，是否與二人曾有過的奇說怪論為人訕笑及視為無稽之談有關？此或值得深究爬梳。

---

\* 本文係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知識文本的生成與閱讀網絡：民初報刊雜誌中『論學書筭』、『書評』的學術話語探析（1911-1949）」（MOST 107-2410-H-004-164）執行成果之一。論文蒙審查者惠賜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 二、衛、孫二人之論學及相關書劄

衛聚賢（別署「衛大法師」）1926年考入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二屆，得以親炙王國維（1877-1927）、梁啟超（1873-1929）等四大導師及講師李濟（1896-1979），尤其畢業論文《「春秋」研究》與《「左傳」真偽考》，深受王國維及梁啟超指點。衛氏一方面專研《春秋》、《左傳》、《國語》等經學與歷史文獻；二方面也涉獵社會、經濟以及考古、民俗等跨領域學科知識，有《中國社會史》、《中國財政史》、《中國商業史》、《山西票號史》、《古今貨幣》、《中國考古學史》、《古器物學》、《政學系與我的恩怨》……等著作問世。衛聚賢在清華國學研究院之學友，有劉節、徐中舒、王力、姜亮夫、高亨、劉盼遂、陸侃如、吳其昌、羅根澤等，這些同學後來多成為各方學術之領航者。衛氏也因從事考古、金石方面的研究，與郭沫若（1892-1978）、馬衡（1881-1955）、常任俠（1904-1996）等交往過甚，繼而在上世紀30、40年代成為名噪一時的學者。

衛聚賢在清華讀書期間，曾與同學合組「述學社」，反對「信古」及「媚古」之態度。衛氏親炙之導師王國維曾在1925年的《古史新證》當中，提出所謂的「二重證據法」：

至於近世乃知孔安國本《尚書》之偽，紀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過，乃並堯、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於懷疑之態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惜於古史材料未嘗為充分之處理也。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sup>1</sup>

《古史新證》原為王氏課堂授課講義，所謂「懷疑之態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衛聚賢的疑古態度以及後來將歷史與考古結合的研究方法，顯然受導師王國維「二

<sup>1</sup> 王國維：〈古史新證·第一章總論〉，收入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11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頁241-242。

重證據法」啟迪甚深，同時也受到當時顧頤剛領導的「疑古」風氣熏陶。衛聚賢將古史研究與疑古方法結合，寫成《左傳研究》和《春秋研究》二書。後來衛氏在太原興賢大學任教時，又著有《國語研究》，此三本《研究》結集為《古史研究》第1集。然而，衛聚賢最引以為傲的《春秋》、《左傳》研究，卻受到孫次舟的質疑。1934年孫次舟曾為文討論衛氏有關孔子與《春秋》之研究，文中說道：

衛氏古史研究，共分三編：一為春秋的研究，二為左傳的研究，三為國語的研究。此三編中，以國語的研究為較佳，以其尚未為康有為等所惑，且克證明現行國語與左傳記事之違異，以見現行國語並非左傳之前身也。至春秋及左傳兩編，則結論殊為乖謬。衛氏不信左傳為春秋時物，當受瑞典珂羅倂倫左傳真偽攷（陸侃如譯）之影響；但其斷左傳為子夏所作，傳之者為衛左氏人吳起，則甚難置信。而其春秋的研究，仍主孔子作春秋之說，尤為違於真實。<sup>2</sup>

文中所提到的珂羅倂倫，即高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1889-1978），1926年高本漢在《哥德堡大學年鑒》上發表了一篇關於《左傳》真偽問題的論文，這篇文章上半部分評介歷來關於《左傳》真偽問題的各派觀點及其學術方法；下半部分則以現代語言學分析《左傳》的文法，並對《左傳》真偽及作者問題提出新的意見。論文發表的第二年，即由陸侃如（1903-1978）口譯、衛聚賢筆受，陸、衛兩位國學研究院同學的合作，經過導師趙元任（1892-1982）的校訂，題作〈論左傳之真偽及其性質〉，發表於上海開明書店發行的《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第1卷第6、7/8號（1927.9.20、11.20）。而後新月書店又將這篇論文出版單行本，改名《左傳真偽考》（1927），書後有衛聚賢的〈跋〉。衛氏雖能在高本漢的研究基礎上有所新意，但「疑古」不夠徹底，也因此孫次舟接著批評道：「衛氏言論語不記孔子作春秋者，以孔子所作之春秋，只傳於子夏，被子夏帶往西河，故東方學者不知孔子有作春秋事。此言殊屬荒誕。設孔子曾作春秋，萬無只傳於子夏之理。即傳於子夏，其他弟子亦萬無不知之理。」<sup>3</sup>所謂「荒誕」之批評，是質疑衛氏治學存乎「臆測」，

<sup>2</sup> 孫次舟：〈評衛聚賢著古史研究因論孔子未作春秋〉，《圖書評論》2：5（1934.1），頁3。

<sup>3</sup> 孫次舟：〈評衛聚賢著古史研究因論孔子未作春秋〉，頁7。

然正如疑古學人常予人只能在字裡行堆揣度一般，孫氏不免也陷入自己所批評的「臆測」之中，他認為：

孔子既無作春秋事，然則現行春秋，由何而來？亦當有所探索也。竊謂現行春秋與左傳本為一體，其產生當在孟子之前，其前身為魯春秋，經儒家後學略加整理，遂為今之春秋左氏傳矣。洎乎漢初，公羊之徒，私逞胸臆，取左傳魯哀公十四年以前之經，離左傳而單行，指為孔子所作，復詳述其微言大義，而為春秋公羊傳。不知其於古無所取徵也。茲詳徵古籍，以實吾說。<sup>4</sup>

當落入「公羊之徒，私逞胸臆」的揣臆，顯然不脫傳統今、古文爭議之思維，此正如前述孫次舟認為衛聚賢《國語》研究較佳，是因為「尚未為康有為等所惑」一樣。當康有為（1858-1927）、錢玄同（1887-1939）二人主張《左傳》為劉歆偽造，錢玄同力證《左傳》是劉歆將原本《國語》二書瓜分為二，孫次舟曾撰文〈左傳國語原非一書證〉<sup>5</sup>加以駁斥。不過，古史辨學者表面上雖對康有為之託古改制有所抨擊，但誠如當代學者也早已指出，古史辨的興起，正是源於廖平、康有為等今文學家將孔子及其經典「意識形態化」，才有古史辨相關學人在不信聖人託古改制的前提下，展開疑經辨偽的風潮。<sup>6</sup>

1937 年孫次舟在自己主編的刊物《歷史與考古》第 3 期（1937），放上幾封與當時學人之通訊，其中包括衛、孫兩次往返書信之刊載：

次舟先生：

大著歷史與考古第二回已拜讀了，其中關於周人開國考一節，以周為西方民族，賢以周曾在山東，被殷人所敗，退於山西上黨，復移於河東，又渡河而西至陝至甘，後向東發展，在余古史研究第三集中，該書由商務出版，月前已校過了，大約不久可出版，出版後當送上請教。

請將歷史與考古第一回，以及以後的第三回……續寄，以便拜讀。又賢在時

<sup>4</sup> 孫次舟：〈評衛聚賢著古史研究因論孔子未作春秋〉，頁 20。

<sup>5</sup> 該文分三期刊登，依序為孫次舟：〈左傳國語原非一書證〉，《責善半月刊》1：4（1940.5），頁 2-6。孫次舟：〈左傳國語原非一書證（續）〉，《責善半月刊》1：6（1940.5），頁 7-10。孫次舟：〈左傳國語原非一書證（續）〉，《責善半月刊》1：7（1940.6），頁 11-16。

<sup>6</sup> 詳參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

事新報編古代文化，每星期三出一期，請為指教。順候教安。

衛聚賢鞠躬四月二十三日

編者案：衛先生對周人開國問題，另有意見，甚盼早日獲讀偉著，則拙文覆  
瓿可也。編者學識淺薄，不敢漫言批評，惟數年前曾因讀古史研究，略受啟  
發，成論孔子未作春秋一文，載諸圖書評論第二卷五期，不悉衛先生見到此  
文否？還望賜以指教焉。（孫次舟）<sup>7</sup>

此封信函透露先前孫次舟批評衛聚賢有關《春秋》研究的見解，事隔三年衛聚賢並未有所回應，這顯然牽涉其學術性格，並非好戰之士。衛聚賢因其學術興趣廣泛，不斷涉獵新議題、新事物，較少在鉅釘瑣碎的議題上打轉，且衛氏長期從事考古工作，大抵也鮮有時間回應相關之挑戰。從衛聚賢大量著述觀之，其多發新意而少回應舊文，這點與孫次舟是有明顯不同。此外，信中還提及衛聚賢《古史研究》第3集，是受當時流行唯物社會史觀以及社會史論戰影響，加上衛氏自己研讀參考摩爾根《古代社會》等書，反映在《古史研究》第3集中就有中國的「母系時代」、「氏族社會」、「奴隸社會」之討論。書中並研究中國民族的來源。也因此衛氏認為周民族曾在山東，後才遷徙至陝甘，這亦涉及當時學術界討論關於中華民族在夏商周三代的地理遷徙狀況，以及東方文化是否受西方文化傳入之影響。在《歷史與考古》第3期中，也刊載衛聚賢另封來函及孫次舟之覆信：

次舟先生：手示讀過了。先生治學精神甚可佩，但學術界為舊勢力及惡勢力所包辦，先生的言論，足使學棍見忌，……賢為過來人，深知其苦。奮鬥的精神可佩，但在這種社會環境之中，能打出一條出路則不易……。南京棲霞山六朝石柱受希臘影響，無書可參考，賢為此論者，（一）柱式與希臘同而與中國則否。（二）石柱橫石適成十字形，與耶教或有關。（三）橫石下有飛人，頂端有飛獸。飛人飛獸非中國物，見余古史研究第二期。<sup>8</sup>

信函中衛聚賢提及「舊勢力、惡勢力、學棍」所指何人不得而知，但兩人疑古拓新的研究進路，顯然會帶來某些學人學術成見反彈。信末所言「南京棲霞山六朝石柱

<sup>7</sup> 衛聚賢、孫次舟：〈通訊一〉，《歷史與考古》3（1937.5），頁22-23。

<sup>8</sup> 衛聚賢、孫次舟：〈通訊一〉，頁23-24。

受希臘影響」，與衛聚賢參與南京棲霞山六朝墓遺址調查，見到「希臘式十字架石柱」有關。<sup>9</sup>衛聚賢過去曾提出中國古代文化為西方、印度傳來，因此棲霞山六朝石柱亦循此見解。衛氏在 1934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古史研究》第 2 集中，就集中討論《山海經》、《穆天子傳》、《墨子》、《老子》、《扁鵲》等書受外來文化影響的可能，並舉史籍文獻及考古資料來說明。尤其衛聚賢認為自己將中國學術受外來影響時間訂在戰國中期，相較於其他學者還是保守的，這些學者包括：

安特生據新石器陶器上的花紋，李濟之據殷墟銅器的形狀，據說中國在新石器時代及殷代與歐洲已有交通，文化亦曾受其影響。至藤田豐八認西周時所編詩經的周頌豳風及春秋末年所編的左傳，也說受有外來的影響。在空間上，我祇敢說到印度，而安特生以為亞述，李濟之以為北歐，小川琢治以為希臘埃及，中國的學術均有受其影響，作此荒唐之說，中外均有人在，故彙其說以為探討。<sup>10</sup>

以上所指學者，李濟（1896-1979）為衛聚賢清華國學研究院之師長，衛氏之考古學識來自於李濟之傳授，李濟也曾為衛聚賢所撰《中國考古小史》一書作序。而安特生（1874-1960）為瑞典考古學者，1921 年在河南澠池仰韶村發現史前文化，他曾指出中國遠古文化是由西方經西亞地區傳入的。另，日人藤田豐八（1869-1929）擔任過京師大學堂教習，著有《東西交涉史の研究》；小川琢治（1870-1941）著有《支那歷史地理研究》，也都強調中國文化受外來影響。這樣的論調或有爭議討論的空間，然而相較於晚清同樣面對「西來說」的論調，民初在中國境內的實地考古，實際上更多了器物出土以為佐證。另一方面，在民初政治社會動盪、帝國勢力強佔租借地，以及日軍等外敵環伺的背景下，文化精神與民族主義的鉤合，又常讓學術難保持其純粹議論的空間。站在與外人學術「爭勝」以顯國力的前提下，以新穎之說代表學術觀點的國際化及交流，也常是奇說怪論醞釀的溫床。對於衛聚賢的來函，孫次舟下了案語：

<sup>9</sup> 衛聚賢：《中國考古小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頁 78-80。

<sup>10</sup> 衛聚賢：《古史研究·總序》第 2 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頁 1-2。

編者案：編者以草漢琅邪相劉君神道石柱續考一文，在下篇中，涉及衛先生張璜梁代陵墓考漢譯本序文之論說，乃請教於衛先生以所據之參考書，衛先生因有此答，各方面皆與以極誠懇率直之教言，致足銘感。關於中國神道石柱，與希臘石柱之關係，編者在下回將續有論文刊布，乃對滕固之說，有所訂補，吾人其知，在今日而言考古，須有世界文化史之常識，若仍追步清人之舊轍，其不陷於閉門造車者幾希矣。<sup>11</sup>

信中提到的滕固（1901-1941）為孫次舟之友人，滕氏在 1930 年代的學術圈頗為活躍，學術專業橫跨藝術史、美術、建築、考古等。尤其對上世紀 30 年代新出土之漢墓，做了許多實際探勘考察。關於 30 年代被發現的琅邪相劉君神道石柱，孫次舟曾寫長文分兩別在《歷史與考古》第 3、4 期（1937）刊登。尤其內容還針對史學前輩朱希祖（1879-1944）提出批評，在〈漢琅邪相劉君神道石柱續考——駁朱希祖教授〉文中，孫次舟說道：

近代發現之陵墓神道石柱，以山東省立圖書館所藏之漢琅琊相劉君神道石柱為最古。專文考證之者，有父執王獻唐先生。立論涉及之者，有滕固先生。此外雖未提及此石柱，但或論神道碑碣，或論六朝陵墓石柱，與此亦不無關涉，則朱希祖僕父子之大文是也。余以生為魯人，不時與此劉君神道石柱相晤，但魯人則皆不識其為何物，殊為遺憾！茲承諸家考論之餘，對劉君神道石柱，略作考證，以質鄉人之明達者，此所謂自數家珍，非敢向外人說法也。<sup>12</sup>

孫次舟分別從「實物的借證、書本的記載、神道非羨道、神道石柱非闕、神道石柱不能稱碣」等各個面向，逐一駁斥朱希祖之見，而後又以神道石柱在漢代當稱「神道表」的角度來研核神道石柱之形制。其中也對於衛聚賢、朱榎（1907-1968，朱希祖之子）二人謂南朝梁石柱受希臘之影響，而不知神道石柱之創製始於漢代，提出糾正。最重要的是文末指摘朱希祖的研究可能有「固陋」、「攘美」之嫌，顯露對史學前輩的挑戰及批判：

關於六朝陵墓之調查，實始於上海徐家匯司鐸張璜先生。其書名梁代陵墓考，

<sup>11</sup> 衛聚賢、孫次舟：〈通訊一〉，頁 24。

<sup>12</sup> 孫次舟：〈漢琅邪相劉君神道石柱續考——駁朱希祖教授〉，《歷史與考古》3（1937.5），頁 2。

民國元年用法文寫成付印，（色伽蘭的中國古代之石刻，已引其說。）至一九年，李卓譯為漢文，葉恭綽為之排印行世，其書插圖甚富，解說亦簡練。但在朱希祖輩為六朝陵墓調查報告書時，朱氏開端即曰：「調查六朝陵墓之舉，先基於希祖與長子僕私人之調查。」核其詞意，一似調查六朝陵墓之勝舉，自彼父子開其端，而往昔無人焉者。此等夜郎自大之口吻，吾人除贈之以微哂外，別無他言。朱氏知否在二十年前，已有張璜先生之調查？設其未見張氏書，是為固陋；如見人之書，而掩人之名，是為攘美。二者必居其一矣！<sup>13</sup>

朱希祖曾主持北大史學系，1934年擔任南京中央大學歷史系主任及古物保管委員會主任，曾與其子朱僕對南京古跡實地勘查，撰成《六朝陵墓調查報告》。另，朱氏為章太炎弟子，對於版本、目錄、校讎、金石、考古等學問浸淫亦深，然碰到好為駁論的孫次舟，不僅在「神道石柱」的考訂上與朱希祖針鋒相對，另外，對於朱希祖1939年曾發表的〈古蜀國為蠶國說〉（《時事新報》副刊〈學燈〉第44期）所提出的蠶叢為蜀中蠶業之祖的論點，孫次舟同年也隨之發表〈從蜀地神話中的蠶叢說到殯葬的蠶玉〉一文提到：

近中以不滿於朱希祖先生「古蜀國為蠶國說」的武斷，曾著文加以駁正。主張：在先秦時代，蜀本夷國，並非漢人領土。及司馬錯伐蜀之後，至秦漢之際，漢人始逐漸向蜀地移民，而原始居住蜀地之夷民，乃大部向南遷徙，停留於越巂一帶。在先秦，蜀地並無蠶業，尚書禹貢所載梁州貢品中，無絲織物，便一力證。即史記漢書所記蜀地出產，亦未見有絲織品之痕跡。蜀地絲織業之興盛，當在東漢末年，故三國志乃屢言蜀地出錦事也。拙文寫成之後，又見李則綱「始祖的誕生與圖騰」一文，（商務百科小叢書之一）乃以「圖騰」解釋華陽國志所記蜀先王蠶叢之稱號。余以為此亦有略加申辯之必要，蓋李氏所見，亦似是而非也。<sup>14</sup>

孫次舟除了論證指出《華陽國志》作為魏晉時代之偽書，其史料的可信度極低以外，

<sup>13</sup> 孫次舟：〈漢琅邪相劉君神道石柱續考——續前〉，《歷史與考古》4（1937.6），頁10。同期孫次舟另有〈釋狄狄：敬質董作賓先生〉，《歷史與考古》4（1937.6），頁16-22，針對董作賓對卜辭的考釋也提出質疑。

<sup>14</sup> 孫次舟：〈從蜀地神話中的蠶叢說到殯葬的蠶玉〉，《經世戰時特刊》47/48（1939.9），頁55-56。

孫氏並提到：「予在駁正朱希祖之文字中，據秦策及漢書地理志，以斷古蜀為夷族……漢武帝時，蜀夷已大部被迫南遷而『蜀』遂為漢郡所專有而非夷族之稱矣。」<sup>15</sup>孫次舟並挑戰朱希祖擅長的文字聲韻學，在文中討論「蜀」「叟」音轉之關係，指出「邛都」即「蜀」「叟」之緩讀，因而斷定：「在東漢時代，盤據越巂」一帶之蜀叟，有三十餘種，為叟（前漢稱邛都）為大族也。」<sup>16</sup>孫次舟頗自豪此一結論，文末並做預告「拙著〈駁朱希祖古蜀國為蠶國說〉，約萬餘言，擬在《益世報》副刊發表，特先預告。」<sup>17</sup>像這樣對於學術論文的預先宣傳，在當時學人撰文態度上並不常見，除了孫次舟個人性格使然，另一宣傳重點當然是在「駁朱希祖」這幾個字上。雖然孫次舟預告駁文萬餘言準備發表刊登，然而相關文章〈讀「古蜀國為蠶國說」的獻疑〉一文，卻晚了兩年，直到1941年的《齊魯學報》創刊號才得以問世。孫次舟於文中提出異議，否定「蜀、蠶」二字在文字上及實物上的關聯，並強調古蜀國蠶業並不發達，而另從神話傳說及民俗出土文物等，論斷四川越巂之獠獯族，為蜀夷之苗裔。<sup>18</sup>該文發表既非原來擬登之《益世報》，且將名稱「駁」改成「獻疑」，語氣顯見和緩。此一「駁文」流浪兩年應不致於是戰火因素延宕<sup>19</sup>，是否有學術及其他相關人事因素干擾，頗耐人尋味。

孫次舟對學界的「叫陣」非僅此樁，前述衛聚賢與孫次舟的通信中，衛聚賢身為友人顯然有忠告表達於函中，因此孫次舟才會提到：

衛先生甚為編者擔憂，以為處今之世，奮鬥不易成功，此非過來人不能道出，亦非忠實於學問者，不能向人如此坦白。吾人除領受衛先生之盛意外，亦只有仍本初衷奮鬥下去，至於成敗利鈍，非所敢計。章實齋有云：「鸚鵡啁啾，和者多也；茅葦黃白，靡者眾也。鳳高翔於千仞，桐孤生於百尋，知其寡和

<sup>15</sup> 孫次舟：〈從蜀地神話中的蠶叢說到殯葬的蠶玉〉，頁57。

<sup>16</sup> 孫次舟：〈從蜀地神話中的蠶叢說到殯葬的蠶玉〉，頁57。

<sup>17</sup> 孫次舟：〈從蜀地神話中的蠶叢說到殯葬的蠶玉〉，頁57。

<sup>18</sup> 孫次舟：〈讀「古蜀國為蠶國說」的獻疑〉，《齊魯學報》1（1941.1），頁158-179。除此文外，相關文章還有孫次舟：〈古蜀國之起源〉，分載於《星期評論》22（1941.5），頁3-5；《星期評論》23（1941.5），頁9-11。相關諸文顯見孫次舟在「蜀國是否為蠶國」此議題上著力甚深。

<sup>19</sup> 1938年《益世報》即在雲南昆明復刊發行，且孫次舟1939年有〈論滕縣銅器羣之年代及邾國之起源〉一文，也是刊載在《益世報（昆明版）·史學第5期》第4版，1939年2月21日。

無偶，而不能屈折以從眾者，亦勢也」。吾人所處，實與章氏同慨，亦只求適吾事而已，難求其全。<sup>20</sup>

衛、孫兩人皆善用歷史、考古、民俗、神話、文字（語言）等相關知識背景研究古史，且涉及漢族及其他民族調查。其中引用先秦兩漢文獻特多，再輔以考古出土器物（含文字、圖像）或民俗調查之參證，也因此在 1930 至 1940 年代的史學論述上，二人在顧頡剛（1893-1980）、傅斯年（1896-1950）等學者外，另闢蹊徑取得學術發表的機會。當然，報刊是他們能迅速發言並喚起迴響的重要媒介。然而取得發言權是一回事，能否得到認可又是另一層面的問題。尤其以當時歷史結合考古所做的研究，雖能帶出一番「新史學」風貌，但此一新史學之動向也不全然是純粹學術方法的問題，尤其「外侮」當前，政治及軍事力量對於學術乃至整個民族文化所形成的壓迫，都使得民初的學術關懷難以與民族主義脫鉤。

### 三、西來乎？——史地研究及文化民族主義

抗戰時間大批學人遷徙「大後方」入蜀，帶動蜀地歷史文化相關研究，也就近掘地考古。因此除了孫次舟等學人關心蜀地文化，衛聚賢在他所主持的《說文月刊》當中，也於 1941、1942 年左右分別有數篇〈巴蜀文化〉的文章發表。衛聚賢對考古學曾下過工夫，有《中國考古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年）之專著，此外，衛氏亦多親臨考古現場進行探勘挖掘，這是孫次舟遠遠不及的（孫多從考古著述發表成果吸收，而非親臨考掘）。衛聚賢 1928 年任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長；1929 年發掘南京明故宮；1930 年主持南京棲霞山三國墓葬發掘。此外，他還參與創建了「吳越史地研究會」和「巴蜀史地研究會」，推動吳越地區和四川地區的考古學研究。

然而這些幾已被遺忘的「豐功偉業」，似乎都不及他曾倡議之怪說：「墨子為印度人」，仍為今人所樂道引為趣談。關於墨子其人及書籍的討論，晚清以降即為顯學，

<sup>20</sup> 衛聚賢、孫次舟：〈通訊一〉，頁 24。

因訓「墨」為「黑」，引發墨子所屬人種的熱議。此外，《墨子》書中「墨辯」的科學性及邏輯性，符合民初新文化運動對於「賽先生」的鼓吹，也因此如梁啟超、胡適、章太炎等學者，就曾經對墨辯展開精彩之論析。以 1920 年代末期為例，關於墨子國籍的論戰，發端於 1928 年 4 月胡懷琛（1886-1938）發表〈墨子為印度人辨〉，先後有鄭師許、吳進修、方授楚、陳登源、衛聚賢、金祖同、陳良盛等參與論戰。爭辯的主要問題是墨子是否為印度人或阿拉伯人？是否為佛教徒或婆羅門教徒？其中胡懷琛、衛聚賢等主張墨子為外國人；方授楚（1898-1956）、陳登源等主墨子為中國人。胡懷琛《墨子學辨》1929 年 10 月出版，該書首列衛聚賢 1929 年 6 月所寫的〈序〉，序中先從肯定顧頡剛的疑古態度入手，反駁方授楚對胡懷琛的謾罵。其次否決「西學中源」之說，為了證明墨子為印度人，衛聚賢亦寫下〈墨子老子是印度人的攷證〉一文，發表於《認識週報》1929 年第 1 卷第 2 期。

事實上，衛氏認為先秦兩漢歷史文化與印度的淵源還不止墨子一事，例如他也認為《詩·豳風·七月》所云：「稱彼兕觥，萬壽無疆」，這在「印度亦有似犀牛角作酒杯，有靈妙之方。」<sup>21</sup>此外，他更信誓旦旦的指出《山海經》是墨子的學生印度人隨巢子之遊記：

山海經相傳夏禹時作，其時是戰國中年的作品，作的人是波斯人或者印度婆羅門教人，到中國遊歷，作成一部講山講水講海外故事的書，以山為主原名「山經」，後因海外的故事也不少，故在漢代的人加上「海」字名為山海經。余作山海經研究，曾用了二十三個方法證明山海經係印度人到中國作的，醫藥也是其中之一。<sup>22</sup>

衛聚賢甚至認為「蠱」即「花柳病」，一般學者認為中國的花柳病是從歐西傳來，但衛氏反向立說，主張：「美洲印地安人為蒙古種，於東漢時由伯零海峽渡海至美洲，蒙古與晉為鄰，其病有相傳的可能。蒙古帶其病至羣洲。」<sup>23</sup>相較於一般學者認為中國古代醫藥發達之常見，衛聚賢也持相反意見，主張：「中國醫學發達很晚……西漢末年

<sup>21</sup> 衛聚賢：〈中外文化接觸最早之期待〉，《中外文化》1：1（1937.2），頁 5。

<sup>22</sup> 衛聚賢：〈山海經中的醫藥〉，《華西醫藥雜誌》1：10（1947.10），頁 20。

<sup>23</sup> 衛聚賢：〈山海經中的醫藥〉，頁 24。

假托的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藥物，也很幼稚。而印度在吠陀時代醫學就很發達。」<sup>24</sup>除此之外，到了 1947、1948 年左右，他仍堅信漢代名醫扁鵲的醫術，也是來自於印度。<sup>25</sup>這種「病菌」由東（中國山西一帶）經過蒙古傳到西方（美洲）；相對的，「醫學」則由西（印度）傳東（中國），在衛聚賢心中，文化優劣高低得以分判。這樣的奇說，也許被視為荒誕之言或謬說，然而作為學術現象，仍有其在 20 世紀初中國學術史上的意義與價值，尤其可以進一步追問的是：何以衛聚賢會有如此學術見解？甚至可以進一步瞭解，原來先秦兩漢時代「印度」影響中國，正是他所認為「中學西源」說之學術信念的一種印證。

在 1928 年參與胡懷琛陣營主張墨子為外國人之後，顯然衛聚賢找到可以「挾洋人以自重」的利器，那是德國人孔拉第所著的〈戰國時中國所受的印度影響〉專文。衛氏本身因家貧不曾出國留學，其不諳外文，從前述透過同學陸侃如口譯而自己筆述完成高本漢之《左傳真偽考》就可知曉。也因此衛氏希冀能透過翻譯作為瞭解世界漢學以及相關歷史知識的窗口，尤其是考古、文化交流等學問。由德國人孔拉第（August Conrady, 1864-1925，另一中文名字為「孔好古」）著，衛聚賢掛名與李森合譯的〈戰國時中國所受的印度影響〉於 1933 年就應運而生，孔拉第的文章中提到：

《莊子》中的「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等等話語，表現出很強的印度《奧義書》之氣息。而「吸風飲露」是道家的神的一種特性，他是「超脫者」「不死者」這對於印度的 Siddha 是很充分的對照。<sup>26</sup>

除莊子以外，孔拉第也希望「把老子的著述裡的印度要素系統的拿來探究一下。」<sup>27</sup>孔拉第是國際知名漢學家，王國維《流沙墜簡·序》曾提到孔拉第之名。衛聚賢有可能從王國維處聽聞認識了孔拉第，因此選擇《德國東洋學會雜誌》第 60 冊翻譯此

<sup>24</sup> 衛聚賢：〈山海經中的醫藥〉，頁 24。

<sup>25</sup> 衛聚賢：〈扁鵲的醫術來自印度〉，《華西醫藥雜誌》2：1（1947.4），頁 20-26。衛聚賢：〈扁鵲醫術來自印度的答辯〉，《華西醫藥雜誌》3：4-6（1948.9），頁 8-9。

<sup>26</sup> 〔德〕孔拉第（August Conrady）著，衛聚賢、李森合譯：〈戰國時中國所受的印度影響〉，《大學》1：3（1933.10），頁 38。

<sup>27</sup> 〔德〕孔拉第：〈戰國時中國所受的印度影響〉，頁 39。

文。主張春秋戰國之文化受外來文化影響的論調，主要是因為民族遷徙、遣使戰爭、商業貿易等緣故，使得外來文化因此而傳播進來。以上衛氏所述關於墨子及先秦兩漢學術的討論，雖常以出土文獻做為佐證，然畢竟臆測成分居多。史學家陳寅恪（1890-1969）曾有感而發說道：

著者於有意無意之間，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所居處之環境，所薰染之學說，以推測解釋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此弊至今日之談墨學而極矣。今日之墨學者，任何古書古字，絕無依據，亦可隨其一時偶然興會，而為之改移，幾若善博者能呼盧成盧，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國號稱整理國故之普通狀況，誠可為長嘆息者也。<sup>28</sup>

此序為陳寅恪 1930 年為馮友蘭（1895-1990）《中國哲學史》上冊所撰之審查報告，其所批評的正是當時治墨學者的「偶然興會」之言。民初胡適等倡議的「整理國故」與「重估一切價值」，雖然帶來自由研讀之風尚，同時將經學地位下降，讓「史、子、集」部分的文獻地位抬升，然而科學的實證方法絕非「興之所至」可以隨意而談。1923 年，梁啟超針對國故學復活的原因也曾指出：「蓋由吾儕受外來學術之影響，采彼都治學方法以理吾故物，於是乎昔人絕未注意之資料，映吾眼而忽瑩；昔人認為不可理之系統，經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瞭解之語句，旋吾腦而忽暢。質言之，則吾儕所恃之利器，實『洋貨』也。坐是之故，吾儕每喜以歐美現代名物訓釋古書；甚或以歐美現代思想衡量古人。」<sup>29</sup>當然，以衛聚賢所關注的「墨子」及「中西、中印」關係之討論，在晚清已有相似的例證，張自牧（1833-1886）在晚清就認為基督教其實乃源於墨子，而且加上印度、阿拉伯的觀點。他在《瀛海論（中篇）》中說：

耶穌天主之教……蓋墨氏之本旨，而緣飾以桑門天方之說，煦煦為仁、子子為義，兼天下而愛之，撒遂萬物以利之，無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

<sup>28</sup>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金明館叢稿二編》（臺北：里仁書局，1981），頁 247。

<sup>29</sup>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7），頁 13、14。

而一以朋友之道處之，博施尚同，而昧於本末親疏之道。<sup>30</sup>

張自牧認為「天主」二字源於中國。畢竟站在本位主義的立場來說，也就是「西學源於中國」，而非像衛聚賢所主張的中學或中國文化來自於印度與西方。當然，不論是「西學中源論」或者是「中學西源論」，其背後所反映都是一種線性思維下的歷史觀。嚴復（1854-1921）就曾提及此兩種言說之心態：

大抵古書難讀，中國為尤。二千年來，士徇利祿，守闕殘，無獨闢之慮。是以生今日者，乃轉於西學，得識古之用焉。此可與知者道，難與不知者言也。風氣漸通，士知弇陋為恥。西學之事，問塗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訖然謂彼之所精，不外象、數、形下之末；彼之所務，不越功利之間。逞臆為談，不咨其實。討論國聞，審敵自鏡之道，又斷斷乎不如是也。<sup>31</sup>

「士知弇陋為恥」、「逞臆為談，不咨其實」道出了某些學人穿梭在中西學之間的焦慮。除了文化思想之外，晚清以降基於認識到民族國家的組成及相關政治改革訴求，「黃帝」作為民族始祖之形象及相關神話，也引發許多討論。尤其法國出生，曾旅居香港的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 1844-1894）於 1894 年出版《中國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一書，曾提出「中國人種西來說」，認為中華文明的始祖黃帝是來自於古巴比倫，而後率部遷徙到中國境內。拉克伯里這樣的說法曾引起晚清中國士人及日本學界的注目，不論是 1895 年宋恕（1862-1910）的《六字課齋津談》，或者是 1900 年 6 月日本學者白河次郎（1874-1919）、國府種德（1873-1950）合著的《支那文明史》都有所回應。其中最重要的當屬蔣觀雲（1866-1929）於 1903-1904 年《新民叢報》上連載的〈中國人種考〉，對於拉克伯里說法也做了整理介紹，蔣氏還特別指出：「當種族并列之日，而講明吾種之淵源，以團結吾同胞之氣誼，使不敢自慚其祖宗，而陷其種族於劣敗之列焉。其於種族保存，與夫種族進化，有取於是焉必鉅

<sup>30</sup> 清·張自牧：〈瀛海論（中篇）〉，收入葛士濬編：《皇朝經世文續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卷 102，頁 16 上-19 下。另，潘光哲對張自牧《瀛海論》與《蠡測卮言》有詳細考述，並從更為寬闊的思潮來理解張自牧的關懷所在。詳參潘光哲：〈張自牧論著考釋笥記——附論深化晚清思想史研究的一點思考〉，《新史學》11：4（2000.12），頁 105-121。

<sup>31</sup> 嚴復：《天演論·自序》，收入王栻主編：《嚴復集》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1320-1321。

矣。」<sup>32</sup>由這段闡述，可見「中國人種」相關問題討論，除學術意義外，晚清相關民族神話與國族論述之關係，更多挾帶的是西強中弱的民族危機及政治改革訴求。除上述學者以外，其他如劉師培、章太炎、繆鳳林等也都有正反意見的相關回應。<sup>33</sup>當然，不同於晚清學人保種圖強的意念，衛聚賢等意見是在民國肇建以後的 1920 年代後期開始，以學術思潮來說，是結合古史辨風潮及考古兩方面的成果，共同匯聚成這些奇說怪論孕育的溫床。若以顧頡剛及傅斯年分別作為「古史辨」及「考古」的學術意向代表，兩人之意見也正好可以作為瞭解衛聚賢與孫次舟治學趨向的相關背景。

中研院史語所成立於 1928 年，3 月先於廣州中山大學籌設，4 月下旬、5 月上旬編寫之〈歷史語言研究所組織大綱〉、預算表、集刊目、工作計畫書等，顧頡剛原都參與起草工作，後因與傅斯年意見相左而離開史語所。在史語所 1928 年 10 月印行的《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 本第 1 分最後「所務記載」當中，曾刊載同年稍早 5 月時署名「顧頡剛、傅斯年提議」所撰寫的〈所務記載・造像徵集啟〉，內文特別說道：

中國自漢以來，外國物事流入中國者，何代無有，而以六朝唐世為尤繁，藝術歌樂每以胡名，固不僅「木菴隨天馬，葡萄逐漢臣」而已。夫以亞歷山大為名之城，見於班勇所記（烏戈山離），敘述印度日耳曼民族容體習俗，出於張騫所述，則知自西漢時中國已與希臘波斯文化區域及吐火羅等之先世有接觸，後來歷傳必有影響，中國人只於此等事之流變，略而不注意耳。……若不先將存在材料羣聚之，視其因時代之變遷，因地方之變遷，則識印竹於大夏，發燕幣於美洲，單件孤證，徒滋誤會者矣。……先將一切刻石造像塑像壁畫等，為系統之搨拓及影照，並分別定其年代（其可能者），然後為一部分之工作者，可有詳細之憑借，為比較之研究者，可得不局促之資料，必能發啟新知識，糾正舊空虛也。<sup>34</sup>

<sup>32</sup> 蔣觀雲：《中國人種考》（上海：華通書局，1929），頁 186。

<sup>33</sup> 關於民族神話與晚清國族建構的關係，可參閱孫江：〈拉克伯里「中國文明西來說」在東亞的傳布與文本之比較〉，《歷史研究》1（2010.2），頁 116-137。

<sup>34</sup> 顧頡剛、傅斯年：〈所務記載・造像徵集啟〉，《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1928.10），

此段顧頡剛、傅斯年雙方共同署名的文字，特別強調中西交流從漢代才開始，並未認可從戰國即有，漢代與異族的接觸，包括「希臘波斯文化區域及吐火羅等」。文中所述符合傅斯年認為「史學即史料學」的觀點，包含「一切刻石造像塑像壁畫」等「非文字」的材料都是歷史研究對象。〈所務記載・造像徵集啟〉一文還指出德人格林韋都（Gruenwedel）及勒高克（Le Coq）等研究「雖此兩君著作有時過於作結論，有時又類幻想，然此種綫絡有甚多待尋之寶藏，可斷言也。不知有此道路斯為墨守之愚」<sup>35</sup>，當此文指出德籍學者研究利弊之處，也正足以揭示中國學者如何在研究之途上進一步提升。況且此與外人「爭勝」的企圖，也正符合傅斯年創辦史語所的初衷。

史語所欲藉由漢代文物與外來文化做比較研究，並藉之以與外人「爭勝」，一方面固源於晚清以降敦煌文物浩劫所喚起的文化民族主義情感；另一方面亦有民初以來如英國的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瑞典的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法國的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等人在中國從事史前文化及西北邊境考古等帶來的刺激影響。在 1930 年代西北與漢代史地有關的考察當中，史語所是缺席的<sup>36</sup>，然而在稍早 1928 年史語所第三組所進行的河南殷墟考古及山東城子崖龍山文化的發掘，則有斐然的成績。與龍山文化同為史前文化的仰韶文化，由瑞典考古學者安特生於 1921 年在河南澠池仰韶村發現，他曾指出中國文化是由西方經西亞地區傳入。然而 1928 年龍山文化的發掘對於傅斯年來說，正是「東方文化西來說」的清理掃除。在〈城子崖序〉中，傅斯年不僅指出「西洋人作中國考古學，猶之乎他們作中國史學之一般，總是多注重在外緣的關係，每忽略於內層的綱領。……沿渤海黃海省份當在考古學上有重要的地位」<sup>37</sup>，而且預言這次由中國考古學家和中國國家學術機關發佈的首次遺址發掘，「頗有深切的意解，雖不敢以創

頁 113-114。

<sup>35</sup> 顧頡剛、傅斯年：〈所務記載・造像徵集啟〉，頁 113。

<sup>36</sup> 史語所直到 1944-1945 年期間，才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等另組「西北科學考察團」，在甘肅、新疆兩地進行考察。其中史語所考古組的考察只限於甘肅境內。

<sup>37</sup> 傅斯年：〈《城子崖》序〉，收入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 3 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頁 236。

新紀元自負，然後來此學之發展，或當承認此一工作為崑崙山下一個長源」。<sup>38</sup>文中還特別說到在史學研究中存在一種「過猶不及的教訓」，傅氏指出：「把設定當作證明，把設想當作設定，把遠若無干的事變作近若有關，把事實惟允許決定的事付之聚訟，都不足以增進新知識，即不足以促成所關學科之進展。」<sup>39</sup>

當上述區域性的考古及學術成果展現在衛聚賢及孫次舟面前，在西北、中原（河南）、山東之外，1930 年左右的江浙吳越之處，以及 1937 以後因戰亂所遷徙的蜀地，對衛、孫二人來說，應該是另一尚待發掘及新穎的學術園地，包括研究歷史、民俗、文化等等相關課題。再者，衛聚賢及孫次舟都深受疑古辨偽之學風影響，然考古文物及金石文字的出土，對於傳世文獻原來所勾稽的歷史輪廓產生極大的修訂作用，而這樣的修訂是科學技術工作下的成果，比起坐在書桌前從事文獻的疑古辨偽，甚至想像所謂「中國文化西來說」的交流路徑，可以說 1920 年代末期考古之「新史學」的眼光及方法，實也衝擊了衛聚賢、孫次舟二人。考古現場固然帶來第一手的史料（器物、文字、圖像等），然考古工作絕非一人之力所能負擔。孫次舟無緣參與學術考古團隊，而衛聚賢則因 1928 年擔任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長，才有 1929 年發掘南京明故宮、1930 年發掘南京棲霞山三國墓葬的機會。然而這樣的團隊，在人力、物力及專業程度上，都無法與中央研究院相比（史語所負責考古的李濟，正是衛聚賢在清華就讀時相關知識的傳授者）。

到了 1931 年瀋陽事變後，外侮使民族存亡形勢愈趨險峻。藉由殷墟及城子崖的發掘，傅斯年於 1933 年撰述了〈夷夏東西說〉一文，傅斯年說道：

自東漢末以來的中國史，常常分南北，或者是政治的分裂，或者由於北方為外族所統制。但這個現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到東漢，長江流域才大發達。到孫吳時，長江流域才有獨立的大政治組織。在三代時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進，由部落到帝國，是以河，濟，淮流域為地盤的。在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勢只有東西之分，並無南北之限。歷史憑藉地理而生，這兩千年的對峙，是東西而不是南北。現在以考察古地理為研究古史的一個道路，似足以證明

---

<sup>38</sup> 傅斯年：〈《城子崖》序〉，頁 236。

<sup>39</sup> 傅斯年：〈《城子崖》序〉，頁 237。

三代及近於三代之前期，大體上有東西不同的兩個系統。這兩個系統，因對峙而生爭鬥，因爭鬥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進展。夷與商屬於東系，夏與周屬於西系。<sup>40</sup>

傅斯年為了論證其「只有東西之分，並無南北之限」的觀點，行文分四章來依序討論：第一章，亳一商一般，探討商族起源的路線問題；第二章，夏跡，分析當時夏人的活動區域；第三章，夏夷交勝，提出夏人主要和夷人作鬥爭；第四章，諸夷姓，指出史書中的太皞少皞實為夷人，由以上討論總結出當時中國兩大文化系統的存在的事實。

關於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討論，距離傅斯年稍近的，稍早有蒙文通（1894-1968）的《古史甄微》（1927），然而蒙文通既無考古經驗，所言還是傳統學者之見。若由此再往前推，則瑞典安特生對於澠池仰韶文化的發掘，及其所提出的「中國文化西來說」，一直是 1920 年代以降學界注目的焦點，此也連帶影響到前述墨子及其他中國古籍是由西方傳來的討論。然而 1930 年代初期傅氏〈夷夏東西說〉出現，是否真的達到了其欲與外人爭勝的壯志？張光直（1931-2001）就曾指出傅斯年此文的學術成就在於：

傅先生是一位歷史天才，是無疑的。他的〈夷夏東西說〉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餘的。這篇文章以前，中國古史毫無系統可言。傅先生說自東漢以來的中國史，常分南北，但在三代與三代以前，中國的政治舞臺，在河、濟、淮流域，地理形勢只有東西之分，而文化亦分為東西兩個系統。自傅先生夷夏東西說出現之後，新的考古資料全部是東西相對的：仰韶——大汶口，河南龍山——山東龍山，二里頭（夏）——商，周——商、夷。傅先生的天才不是表現在華北古史被他的系統預料到了，而是表現在他的東西系統成為一個解釋整個中國大陸古史的一把總鑰匙。<sup>41</sup>

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不只運用傳世文獻，而且常以新出土之甲骨作為證據，貫

<sup>40</sup> 傅斯年：〈夷夏東西說〉，《傅斯年全集》第3卷，頁181-182。

<sup>41</sup> 張光直：〈《傅斯年、董作賓先生百歲紀念專刊》序〉，收入韓復智主編：《傅斯年、董作賓先生百歲紀念專刊》（臺北：中國上古秦漢學會，1995），頁2。

串全文的方法，包括「種族的」及「地理的」。雖然〈夷夏東西說〉的觀點現今看來，多已因考古更多的發掘而得到修正。但學術界後出轉精的研究成果，並無損於諸多學術先見的拓新及引領之功，尤其在眾聲喧嘩的民初學術殿堂上。〈夷夏東西說〉的出現，史學家看中國歷史便有了一個新視野。張光直雖能從考古及歷史專業給予相當高的學術評價，然而尚未能顧及傅斯年撰文背後的民族主義情懷。比起〈夷夏東西說〉問世稍早一年，1932年10月傅斯年出版了《東北史綱》第1卷，這部書的宗旨意在批駁日本學者矢野仁一（1872-1970）散佈的「滿蒙在歷史上非中國領土」論，而這樣的論調，是為了強化日本瀋陽事變後佔領東北成立「滿洲國」的合理性，傅斯年著書即在對此論調從歷史文獻之爬梳進行反擊。

〈夷夏東西說〉所代表的古史多元論，與顧頡剛的古史辨運動也有關聯。顧氏曾一再質疑古代民族出於一元的舊觀念，提出古代民族應當出於多元的推想。衛聚賢、孫次舟雖同受顧頡剛古史辨影響，然衛、孫二人，同屬中研院學術聖殿及其主流學術之外，兩人也嘗撰文與中央研究院學人較勁爭勝、另立新說。例如衛聚賢顯然知道傅斯年對古代文化之「東西相對」意見，然而他自己在主流之外，對於吳越文化的考古成就，就曾說道：「由石器之發現，證明江南文化之古；由陶器花紋之美觀，證明江南文化已高。而吳越幾何形花紋，在殷墟有十餘種相同，與余前主張殷民族由東南至西北之說合。」<sup>42</sup>這與傅斯年〈夷夏東西說〉主張殷代之祖先起自東北方：「商代發迹於東北渤海與古兗州是其建業之地」，正好互別苗頭。也因此當傅斯年為強化東北屬於中國歷史固有領土而撰述《東北史綱》，衛聚賢卻還在強調：「東北之地是中華民族去開發的，不是由東北民族來開發的。中央研究院有出版的東北史綱，主殷人自東北入中原。與余說殷民族自東南至中原不合。」<sup>43</sup>雖然衛聚賢此處捍衛一己學術之見，然誠如「中國文化西來說」、「墨子及山海經等為印度之產物」，在國難當頭，衛氏此一「殷民族自東南至中原」的標新立異之說，也很難得到認同。

就學術資源的分配及話語權力掌握而言，傅斯年在當時位居要津，其結合考古

<sup>42</sup> 衛聚賢：〈中國文化起原於東南發達於西北的探討〉，《東方雜誌》34：7（1937.4），頁149。

<sup>43</sup> 衛聚賢：〈中原民族之開發東北〉，《江蘇研究》3：5/6（1937.6），頁7。

以證古史，背後挾帶濃厚的民族文化情感在裡頭，這樣的學術態度有時也會影響其對於學術資源的安排以及治學趨向的認可與否。1942年4月29日在給朱家驊、翁文灝、葉企孫的信函中，就有一關於學術獎金給予是否允當的意見，傅斯年說道：

昨夜弟借到蟻光炎獎金第三名得獎田汝康君《擺夷之擺》一書一看，頓覺此事大有毛病。蓋擺夷者，吾國雲南省西南部部落之一也，此書之細題云，「芒市那木寨的宗教活動」是其顯為中國國境內之民俗調查也。……是此獎金專為研究中南半島（Indo-Chinese Peninsula）各國各部、及馬來之獎金，並不包括有國內之民族學，故此書無論價值如何，實不在本獎金範圍之內也。各國學院給獎金，亦有擴充其範圍，不拘原條文者，但此事另有一種政治的涵義（Implication）似未可率爾。<sup>44</sup>

學術獎金屬研究事項，何以跟「政治」有所關聯？原因在於傅斯年認為「暹羅係二族……二者皆為泰族，安南亦為泰族（Maspero說），全中南半島之泰族多矣。在中國則桂、滇兩省甚多，黔省亦有，……全中國說泰語者，恐有二千萬人，皆中國人也。近年暹羅忽然不知自量，耍玩大泰主義。于是其改國名之宣言中，曾提到中國有其失地甚大，鑾披汶之演說，數次謂中國有其同胞數千萬。以一支而冒大名，……本所有『龍州泰語』一書，一聞暹羅改國名，立改為『龍州土語』（李方桂著），曾毀版若干，不惜也。」<sup>45</sup>由於暹羅以其語言使用遍及中國西南各省，遂謂中國境內有其失地及同胞，對於傅斯年及其所領導的史語所同仁而言，暹羅此政治性的宣示猶如外侮侵略，史語所並非學術象牙塔，抗戰國難當頭，學術研究之專業也勢必與民族自尊融合，非得釐清不可。除了暹羅的狂妄自大，中國文人亦有附和暹羅政府的相關奇說怪論，深為傅斯年所厭惡，傅氏提及：

雲南有一妄人，名陳紀澄（？）專作怪論，曾謂雲南應屬於印度支那半島，于右任院長見之大怒，在國府紀念週中大罵一翻，並提議稱此半島為中南半島。（中國之南，或可曰中國與南洋，此名甚通。）蓋此事之要點，皆在暹羅

<sup>44</sup> 傅斯年：〈傅斯年致朱家驊、翁文灝、葉企孫（1942年4月29日）〉，收入王汎森等主編：《傅斯年遺札》第3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頁1255。

<sup>45</sup> 傅斯年：〈傅斯年致朱家驊、翁文灝、葉企孫（1942年4月29日）〉，頁1255-1256。

公然（以國家公文為之）謂雲南、廣西等處是其失地。今吾國國家學院于專給（原文明言專給）泰國、越南、緬甸或馬來之研究之獎金中，忽列入雲南一地（其地且並不在交界處）之民俗研究，此之涵義，亦即將雲南劃歸中南半島，且顯示泰國研究可包括雲南一部之人，與暹羅政府之妄言吻合，此非國家學院之所應為也。<sup>46</sup>

陳紀滢（1908-1997）為記者及右翼作家，並非學術中人，其怪論顯然又比衛聚賢、孫次舟等學者的層次更低，缺乏論述。然奇說怪論的殺傷力若涉及民族主義，顯然又都為傅斯年等所不容，也因此給三位友人的信末，傅斯年再次強調：「弄出一個極壞的政治涵義（Implication），殊非國家學院應有之事耳。」<sup>47</sup>在同年（1942）12月16日傅斯年給孫次舟的信中，一樣涉及學術獎金事項，傅斯年婉拒孫次舟的請託說道：「次舟先生大鑒：來書誦悉，查敝院此項獎金前此之給與，皆以實事求是之工作為範圍，不尚辨論。如執事聲請，請另照規定辦法辦理，弟不能代為提出。原件掛號寄還。」<sup>48</sup>由信中可知此獎金由中研院設置給予，尤其史語所以「史料學」為核心，有多少證據說多少話，「實事求是」的研究與信口開河之「奇說怪論」適成背反，傅斯年的婉拒，與其說是在所長職務上為了避嫌，更重要的是與孫次舟的學術認知及趨向有所不同。

#### 四、爭勝心理及話語權力競奪

史語所在傅斯年的帶領下，走的即是「專精」、「提高」、「與外人爭勝」的研究。傅斯年曾說道：「我們不做或者反對所謂普及那一行中的工作……歷史學和語言學之發達，自然於教育上也有相當的關係，但這都不見得即是什麼經國之大業，不朽之

---

<sup>46</sup> 傅斯年：〈傅斯年致朱家驊、翁文灝、葉企孫（1942年4月29日）〉，頁1256。

<sup>47</sup> 傅斯年：〈傅斯年致朱家驊、翁文灝、葉企孫（1942年4月29日）〉，頁1257。

<sup>48</sup> 傅斯年：〈傅斯年致孫次舟（1942年12月16日）〉，《傅斯年遺札》第3卷，頁1369。

盛事」<sup>49</sup>相較於傅斯年來說，顧頡剛在成學過程及古史辨相關討論中，受益於民間詩歌、戲曲、神話、傳說、信仰頗多，對於庶民文化作為史料運用以及民眾教育方面特為著重。若以此衡量孫、衛二人，相較於孫次舟的「孤傲」，衛聚賢還能夠與金同祖、陳志良、何天行、施昕更及胡肇椿等一批「邊緣學者」，成立吳越史地研究會，通過考古調查與挖掘，從「古物」的角度探索南方早期歷史，並成立「博物館」作民眾「普及」之教育。

孫次舟在文章中常引傅斯年著述，顯見其平時注意傅所發表文章。如孫氏在討論戰國諸子著作自行命題、自行撰文，就提到：「關於戰國人著書體裁，可兼參傅孟真先生戰國文籍中之篇式書體一文。」<sup>50</sup>「爭勝」之於傅斯年來說，固可從與「外人」（外籍學者）及學友（顧頡剛）兩方面來分疏討論，但對於孫次舟、衛聚賢而言，「怪說奇論」是二人「爭勝」的另一種意見表達。在孫次舟身上，尤其表現在藉由文字攀附或指摘前賢，對孫氏而言，這樣的「兩手策略」是可以同時並存的。例如有關詩經豳風時代及產地，傅斯年及徐中舒（1898-1991）都曾為文發表意見，且皆刊載於《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一為傅斯年 1928 年在《集刊》第 1 本第 1 分所發表之〈周頌說——附論魯南兩地與詩書之來源〉；一為徐中舒 1936 年在《集刊》第 6 本第 4 分發表之〈豳風說〉。關於兩人之意見，孫次舟雖都有所疑慮。但對於傅斯年，孫次舟還客氣說道：「傅先生首疑豳風當為東方產物，非出於岐周，識見之卓持，使人傾折！惟傅氏此論，只主豳風由魯傳出，但未確指其地理環境即在魯國。」<sup>51</sup>孫氏對傅斯年之作，基本上只指出小處闕漏，但對於徐中舒，就毫不客氣的批評道：「徐中舒先生受傅氏之啟發而為『豳風說』，乃竟肯定豳風各詩，為魯地產物。而春秋時代，為其作期。徐氏文字，引徵繁富，初讀之極足動人聽聞，但細加考核，則仍多商榷處也。」<sup>52</sup>也因此孫次舟逐一引證文獻駁斥徐氏之說。其中還提到徐中舒推測豳風所言之周公，即《左傳》之「宰周公」，孫氏認為「此論實牽強

<sup>49</sup>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1928.10），頁 8。

<sup>50</sup> 孫次舟：〈史記商君列傳史料抉原〉，《史學季刊》1：2（1941.3），頁 84。

<sup>51</sup> 孫次舟：〈詩經豳風的產地及其歷史背景〉，《經世戰時特刊》38（1939.5），頁 15。

<sup>52</sup> 孫次舟：〈詩經豳風的產地及其歷史背景〉，頁 15。

難信」，不僅如此，「至其言『公子』『公孫』，為指魯季氏而言，尤為奇怪之論。」<sup>53</sup>然而在僅存的傳世文獻中欲勾勒作品及歷史全貌，實亦有其困難費解之處，因此孫次舟在強調「豳風絕無為魯詩之可能」之際，也不免揣度：「予假定其產地，當在今河南，為周公東遷後新封地之歌謠，其可能性，較為強大。」<sup>54</sup>徐中舒之見，連孫次舟都說是受傅斯年啟發，前述也提及傅斯年「夷夏東西說」帶來之劃時代影響，豳風所涉及不僅僅是詩作時地的問題，實則背後還有民族遷徙軌跡的意義存在，尤其徐中舒正是主張殷人並非從西方而來。徐中舒與衛聚賢曾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同學，1930年由陳寅恪推薦進入中研院史語所工作，深受傅斯年器重。徐氏在1930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同期刊登的〈耒耜考〉、〈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二文，都是將出土文字與傳世文獻比對進行綿密的考證，其中還有民族學、民俗學、人類學之鑿痕。徐中舒雖非專業考古家，但他善用考古材料，得出的結論也多與李濟、梁思永等人一致。相對的，孫次舟擅長在文獻而非考古，其雖亦偶有涉及出土器物文字使用，但不若衛聚賢或傅斯年、徐中舒等親身歷練參與。因此，孫次舟在批評徐中舒之意見後，不免說道：

今人攷論鐘鼎銘文，有極大之通病，即喜持銅器銘文之人名或記事，以與書冊之記載相附會。以為金文之某人、某事，即書冊之某人某事。若不如此，一似無以立說者然。金文所言，固有與書冊相近者，但亦有相去甚遠，絕非一事者。必欲強拉為一，則必斬足適足，肥造史事。<sup>55</sup>

如果我們對照曾為徐中舒、衛聚賢之師的王國維所強調過的「二重證據法」，孫次舟上述否定之語，頗有與清華學人在方法論上互別苗頭之意味。同樣類似情形，也發生在孫次舟一篇書評所透顯自身學力侷限之窘狀，尤其對外國學者研究成果及考古出土文物的陌生，顯然不及徐中舒乃至顧頡剛之熟稔。原因起於1940年孫次舟讀考古及古文字學家商承祚（1902-1991）著《長沙古物聞見記》一書後，因發生「對骸

<sup>53</sup> 孫次舟：〈詩經豳風的產地及其歷史背影〉，《經世戰時特刊》41-46合刊（1939.9），頁52。

<sup>54</sup> 孫次舟：〈詩經豳風的產地及其歷史背影〉，頁54。

<sup>55</sup> 孫次舟：〈詩經豳風的產地及其歷史背影〉，頁52。

鑊作飲器或溺器一事之研究的興趣」，遂撰〈「長沙古物聞見記」讀後記〉<sup>56</sup>，針對商承祚主張趙襄子和老上單于以敵人頭顱為飲器「非用全顱，取腦蓋加兩耳，如羽觴」的觀點，提出質疑。司馬遷在《史記》〈刺客列傳〉中曾記載了晉國趙襄子漆智伯頭以為飲器，以及〈大宛列傳〉中提到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歷代注家對「飲器」究竟是「酒器」或是「溺器」？便各持一端，爭論不休。孫次舟認為「兩耳無硬骨，如何可用？史記明言用其『頭』，何來只用腦蓋之事？蓋漆頭為飲器者，乃為匈奴之風，當用全頭骨也。」<sup>57</sup>孫次舟文章引起顧頡剛、徐中舒的注意，寫信與之商榷。其中徐中舒 8 月 14 日來信提到：「髑髏為飲器，似日人早已為文論及之矣。此為中亞游牧族之風俗，匈奴西藏均盛行。蒙古時西僧楊惲真珈曾掘理宗墓，以其髑髏為器，其俗似至今尚存西藏間。趙襄子蓋亦受中亞游牧族之影響。溺器之說，似由飲器而誤，不足據也。」<sup>58</sup>顧頡剛來信也說道：「以人頭作樂器，如盃狀，張以皮，此喇嘛教中最普通之物。以作酒杯，亦無不可。惟作溺器則無此大量耳。暇中可到華大博物館中一覽。」<sup>59</sup>這裡學力高下，立刻得到分判。雖然如此，孫次舟仍不改其喜臧否人物之慣性。在一次演講中他就說道：

當前學者，對於以上多方面之研究而知注意從事者，不外三人：1.徐中舒氏，其研究偏重花紋、文字諸方面，對於斷代，稍涉寬廣，使人無法攻擊。2.吳其昌氏，根據漢曆排列西周銅器之年代。此方法表面雖屬精確，而實則可靠性極小。失之一釐，則差之千里。3.郭沫若氏，兼備徐吳二人的方法，有時利用花紋，有時又利用曆法。以上三人，徐郭二氏均可為吾人取法，吳氏的方法則是萬不可學效的。<sup>60</sup>

這裡雖稍肯定了徐中舒、郭沫若（1892-1978），但相對的貶抑吳其昌（1904-1944）。吳其昌亦是清華學子，1925 年考入清華國學研究院，師從王國維、梁啟超，1932 年

<sup>56</sup> 孫次舟：〈「長沙古物聞見記」讀後記〉，《責善半月刊》1：11（1940.8），頁 15-18。

<sup>57</sup> 孫次舟：〈「長沙古物聞見記」讀後記〉，頁 17。

<sup>58</sup> 孫次舟、顧頡剛、徐中舒：〈學術通訊：（二）關於髑髏作酒器的通訊〉，《責善半月刊》1：12（1940.8），頁 23。

<sup>59</sup> 孫次舟、顧頡剛、徐中舒：〈學術通訊：（二）關於髑髏作酒器的通訊〉，頁 23。

<sup>60</sup> 孫次舟、孔玉芳：〈關於銅器研究之基本事項〉，《責善半月刊》2：9（1941.7），頁 17。

任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從孫次舟發表在報刊雜誌的文章、書信乃至演講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好於與學人論戰。包括同儕（如衛聚賢、徐中舒、吳其昌等）、前輩學者（如朱希祖、傅斯年、顧頡剛等）。就連 1940 年抗戰期間錢穆（1895-1990）出版帶有濃烈民族文化精神的《國史大綱》，孫次舟也以「求全之毀」提出訕謗。這使得金毓黻（1887-1962）在日記中也不免為錢穆深感不平，並歸之於孫次舟「怠於自修，而又忌錢君之能修。」<sup>61</sup>當然，跟前輩學者的駁議或商榷，也往往會希冀得到學術殿堂霸主的認可而躋身其中，尤其當時史學界擁有學術資源的傅斯年與顧頡剛，正是孫次舟攀附之對象。在傅斯年留下來的書信中，我們可以看到其對於孫次舟多次的勸告或評價。1940 年 2 月 24 日給孫次舟的信中，傅斯年說道：

次舟先生大鑒：中英庚款會來函附 閣下致華西張校長來信。人生世上，此等到簡單之禮貌，亦或不不（編按：衍一「不」字）能，可歎也。中英庚款會來信，謂華西既不可入，可否仍向徐中舒先生處去。惟以愚見論之，閣下因自謂世上無可指導之人，去亦未必有益。此會補助，聞最多者二年，是則今夏一切結束耳；可自求高就，以騁大才矣。又，來函自稱學生，以閣下之狂，何至如是，僕實受寵若驚。前年初晤，曾以「做實在工夫，勿作無謂辨論」及「虛心整理事實，勿復盛氣馳騁已見」二義相勸，並無一接受，則僕雖廁名指導，實不能為足下師明矣。累次來信，皆不解所云，若談一問題，而為僕所知，自當竭誠奉告，今連篇累牘，皆非僕可以作答者也。<sup>62</sup>

華西張校長指的是張凌高（1890-1955），時任華西協合大學校長。關於孫次舟與張凌高校長「不歡而散」的始末，在《顧頡剛日記》1940 年 1 月 12 日的記載中，有事情發生原委的說明：

<sup>61</sup> 金毓黻 1943 年 9 月 21 日的日記中記載：「報載孫君次舟評錢穆《中國史觀》一文，肆意抨擊，全是小人行徑。韓昌黎詩云：『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其孫君之謂乎！孟子云：『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名愈大，則不虞之譽與求全之毀同時並至。今觀孫君所論，真所謂求全之毀也。且其用心甚屬險惡，摭取《國史大綱》中一二語，以明其不滿於當代，而有訕謗時賢之意，幾欲以此興文字獄，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近頃欲甘心於錢君者，不止孫君一人，皆由其善著書名滿一時使然。韓退之云：『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怠與忌二者，毀之所由來也。孫君本怠於自修，而又忌錢君之能修，所以有此求全之毀。小人可畏，至於如此。古人著書不輕刊佈，直至身後乃得行世，正坐此故。」金毓黻：《靜晤室日記》第 7 冊（瀋陽：遼瀋書社，1993），頁 5228-5229。

<sup>62</sup> 傅斯年：〈傅斯年致孫次舟（1940 年 2 月 24 日）〉，《傅斯年遺札》第 2 卷，頁 1070-1071。

孫次舟君才氣甚旺，亦肯用功，而負才兀傲，目空一切，徒成其為狂生而已。英款補助，派至華大，而該校無屋可居，遂遷怒及於校長，寫信大罵，張校長將此信給我看，以我負有彼指導之責也。此等人叫我如何去指導！<sup>63</sup>

當抗戰時期學人多所顛沛流離，溫飽難續之際，張淩高願給孫次舟任職的機會，就人情事理來說，已構成「施恩」之條件，然孫氏因校舍等資源分配遷怒校長，不僅顧頡剛迴避擔任「指導」教授之身分，即使傅斯年在事發一個多月後寫給求職處處碰壁的孫次舟，也予以諄諄教誨。在傅斯年看來，孫次舟最大問題在於個人「性格」，因此信中教以「實在」「虛心」等治學之道。傅斯年雖無意擔任孫氏之師，但勉勵之餘，也建議其求職「仍向徐中舒先生處去」。「仍」之一字顯然是先前已有所提議，但誠如上述分析，孫次舟已向徐中舒的治學「叫陣」過，且以孫次舟之高傲，徐中舒亦非孫氏可以低頭請託之人。只有傅斯年、顧頡剛在當時史學場域中的權力地位，才是其欲攀附之對象。相關事情過了兩年，孫次舟有所著述，仍請傅斯年幫忙推薦出版，在關於《洛陽伽藍記》正文及注的探討上，傅斯年亦在信中指導孫氏治學之道：

惠書敬悉。大著粗讀一過，用心深細，甚佩甚佩！所標條例，大體可通，然亦恐未可拘泥。（所言有「注」字者為後人所加，甚當甚當！）此書正文、子注乃一人一時之作，與《水經注》之異代二人者不同。惟其如是，故《伽藍記》不易分，亦唯其如此，其分與不分，亦不如《水經注》關係之重要也。愚于此未嘗用心，率言之如此。<sup>64</sup>

此外，孫次舟也嘗試透過傅斯年，欲向史語所借書，傅斯年亦予以婉拒：「次舟先生：本月九、十三兩日大札均悉。有關小說各書，敝所或有或無，例不出借他地，此無可如何者也。足下詈顧頡剛先生各語，實不堪入我之耳。言者縱不自愛，亦當知聽者為何如人也。以後乞勿再惠我以書信，感幸之至矣。」<sup>65</sup>信中提及孫次舟對傅斯年耳語，詈罵顧頡剛之事，應與孫次舟未能獲得齊魯大學續聘，遷怒顧頡剛有關。在

<sup>63</sup>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4卷（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332。

<sup>64</sup> 傅斯年：〈傅斯年致孫次舟（1942年4月30日）〉，《傅斯年遺札》第3卷，頁1257。

<sup>65</sup> 傅斯年：〈傅斯年致孫次舟（1942年8月18日）〉，《傅斯年遺札》第3卷，頁1307。

顧頡剛 1942 年 7 月 14 日的日記中，仍可以看到其對於孫次舟狂妄之姿的無法消受：「次舟脾氣太壞，無人不罵，以致齊大不予續聘，來書告急，然予何能為！予若介紹彼至任何機關服務，則彼罵人之帳將盡登於我之帳矣。」<sup>66</sup>在 1940 到 1942 年抗戰的艱辛歲月中，孫次舟不僅與華西協合大學結怨失去教職，連齊魯大學的研究工作，也因個人性格而遭解雇不予續聘。當然，作為介紹人受累不小的顧頡剛，深感無奈，也因此當 9 月孫次舟主動揚言絕交，顧氏竟有如釋重負之感：「次舟在華西壩，揚言與予絕交，聞之真以得絕為快。」<sup>67</sup>在抗戰結束之後，各大學紛紛回歸原址復校，教員也多重歸崗位之際，在 1947 年 1 月 4 日《大公晚報》〈學宮彙報〉當中有一則新聞記載：「相輝學院下期增聘教授多人，現已接聘者，有前中大教授初大告，金陵大學教授孫次舟二人。」<sup>68</sup>相輝學院為復旦同學會 1946 年在重慶北碚創建，是為紀念復旦創始人馬相伯和校長李登輝而設，孫次舟未能在抗戰勝利後，至學術資源更為豐沛之研究及教育機構任教，抑或「性格決定命運」使然。

1937 年衛聚賢曾撰長文〈離騷的作者——屈原與劉安〉，為好友何天行（1913-1986）所著《楚詞研究》作序，衛聚賢主要是贊同何天行主張淮南王劉安才是《楚辭》作者，且衛文列舉更多史料證成，為《楚辭》作者研究另倡異說。<sup>69</sup>無獨有偶，1944 年 5 月抗戰後期，成都藝文界舉行詩人節紀念會，孫次舟在會上提到屈原是「弄臣」，指出屈原是龍陽君一類的男寵。這樣的怪說在標榜民族氣節，激勵文化精神的抗戰期間提出，顯然是「學術」不正確的。由於批評聲浪席捲而來，孫次舟還前後發表〈屈原是「文學弄臣」的發疑——兼答屈原崇拜者〉、〈屈原討論的最後申辯〉二文（載成都《中央日報·中央副刊》）作為辯駁。孫次舟在〈屈原是「文學弄臣」的發疑——兼答屈原崇拜者〉中說道：「要我報告這位汨羅水鬼……我是從來不把任何一個古代『偶像』放在眼裡的。」因孫氏文章曾引用聞一多（1899-1946）之見解

<sup>66</sup>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 4 卷，頁 708。

<sup>67</sup>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 4 卷，頁 738。

<sup>68</sup> 《大公晚報·學宮彙報》第 1 版，1947 年 1 月 4 日。

<sup>69</sup> 衛聚賢：〈離騷的作者——屈原與劉安〉，收入衛聚賢等：《楚詞研究》（上海：吳越史地研究會，1938），頁 1-19。

作為「背書」之用，聞一多無奈被迫回應說道：

不久以前，在成都，因孫次舟先生闖了一個禍，久不聽見的文學史問題爭論又熱鬧過一陣。在昆明不大能見到那邊的報紙和刊物，所以很少知道那回事的。但孫先生提出的，確乎是個重要問題，它不但屬於文學史，也屬於社會發展史的範圍是個重要問題，它不但屬於文學史，也屬於社會發展史的範圍。<sup>70</sup>

雖然表面上肯定孫次舟提出問題的價值，但在解決問題的答案上，聞一多也並不全然認可。此外，孫次舟關於漢代之奇論亦不少，如〈司馬相如與卓文君〉一文引《西京雜記》卷上：「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這段話，孫次舟下評語說道：「此文描繪文君之美麗，難免有過分形容之處。至所言文君十七八歲而寡，容有依據。想來文君出嫁不久，前夫即死。故一見相如，輒行夜奔。設文君適為『處女』，則恐無此勇敢矣。」<sup>71</sup>這樣的判斷臆測頗多，但嘩眾之效是顯而易見的。對於孫次舟的學術見解，大家只關心屈原是男寵這種帶有閒聊話題之怪論，卻多忽略了孫次舟還有些關於國學方面的考訂著述。當然，「奇說」、「怪論」有其背後個人的心理因素，也有學術內部話語權爭奪的交鋒，更有整個時代學術思潮的影響，且這些因素常常是彼此交織在一起的。無獨有偶，衛聚賢 1969 年發表《中國人發現美洲》；1975 年寫下《中國人發現美洲初考——文字與花紋》，衛氏主張殷人曾東渡美洲，提出東晉高僧法顯在哥倫布之前已到達美洲，認為秘魯人是南宋人後裔等。以上這些主張都強調中國人發現美洲，雖與他 1930、1940 年代見解有所出入，但都同樣的引人側目。

<sup>70</sup> 聞一多：〈屈原問題：敬質孫次舟先生〉，《民主與科學》1：9/10（1945.10），頁6。

<sup>71</sup> 孫次舟：〈司馬相如與卓文君〉，《責善半月刊》1：14（1940.10），頁6。

## 五、結論

民國以來諸多學術上的奇說怪論，固有疑古思潮，新史學之治學方法作為助力，加上史料的考掘蒐羅，由此帶動了歷史研究與地理、考古、語言及其他相關社會科學知識的結合，並產生了許多新穎觀點。然而除了新的治學材料及方法帶出新的學術格局外，另一值得關注的是「報刊雜誌」這種文字的新型載體，在民國以來作為「即時」性的傳媒，是如何「同時」面對存在的讀者，進而串接作者、讀者進行「共時性」的交流（包括在報刊以書信往返進行論學）。民國報刊作為學術性文字的公共媒體，有別於傳統學術文字從抄寫或刊印成典籍的知識生產過程。尤其過去傳統作者心目中預設讀者通常是「後世人」而非同時代的人。即使宋元以降印刷術逐漸發達，有時作者生前著述未能成書，書籍問世尚有待後人集結文字才能以刊刻的「長時期」發展。如是，則讀者面臨一篇（本）學術著作時，或有可能「歷時」已晚，遑論與作者生前進行對話交流（少數作者在撰述過程或與家人、交游、門生論學，但其讀者畢竟是「小眾」而已）。

晚清民國以降，報刊帶來的地域性擴散效應，以及「即時」的學術訊息掌握，其不僅常連結共同關注某一議題的學術社群，且帶來作者創作過程與讀者即時交流的可能。另外，在客觀的學術論述意見背後，主觀且微妙的學術心理，也往往可以透過報刊這一公共傳媒領略一二。當晚清科舉廢除後，報刊傳媒提供了學者一種迥異於過去經由科考揚名立萬的機會，透過報刊傳媒發聲，爾後集結相關文章出版專著，進而在公務部門或教育機構任職。可以說，傳媒對於學術議題、治學趨向、研究方法的氛圍帶動，都是民國以來知識生產到傳播、閱讀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包括報刊許多專欄、專號的學術議題設計，可能連續幾期帶來讀者回饋之筆鋒交戰）。也因此學人對於中國傳統文獻之選擇操弄，或是方法上的比附獨斷，進而走向立異的自我標榜，多是欲藉助傳媒吸引讀者注目，而這一能否吸引注目，關乎撰者存在處境之中個人生計、學術名望，以及對學術話語權的爭奪。換言之，民初學人的怪說，固然有西潮以及時代風氣解放，以及學人喜自我標榜等因素影響治學，但若個

人著述「無由發聲」，則這些奇說怪論亦無從在「即時」的讀者群中發酵，進一步帶來讀者反映，而此反映往往又再刺激了新的奇說怪論繼續生產。因此，本文在史料運用上多採用時代清晰，且能反映「即時性」讀者意見的報刊，即認為報刊傳媒對於民國學術史的形塑作用不容小覷。

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曾對「知識場域」（intellectual field）有過精闢的分析，在他看來，「根據場域概念進行思考就是從關係的角度進行思考。」<sup>72</sup>布迪厄進一步解釋道：

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係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構型（configuration）。正是在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們強加於佔據特定位置的行動者或機構之上的決定性因素之中，這些位置得到了客觀的界定，其根據是這些位置在不同類型的權力（或資本）——佔有這些權力就意味著把持了在這一場域中利害攸關的專門利潤（specific profit）的得益權。<sup>73</sup>

換言之，知識場域既反映了社會背景結構，而個人之習性也同樣在這個背景結構中運作。尤其在知識場域中，佔據這些位置的行動者或機構，為了控制這一場域特有及合法形式的權威，既相互競爭，也形成了種種複雜的網絡社群關係。如果以此角度來觀察孫次舟及衛聚賢，二人常連結各種學術管道（包括報刊媒體）發言，既是與學術場域中的當權者競爭，同時他們奇說怪論的「異端」發言，也在主流場域之外開拓了許多次場域（sub-field）。然而正如布迪厄對於場域分析的所提及的：「正統」與「異端」兩種相互對立的策略是辯證地聯繫在一起的，「正統」通過在文化場域中運作的區隔邏輯產生著自己的「異端」。<sup>74</sup>換言之，正統與異端看似對立，在關係中卻也相互定義。透過傅斯年、顧頡剛等史學「正統」聲音及權力的掌握，孫次舟、衛聚賢等奇說怪論或被歸為異端。然而也正因何謂「正統」之話語被確立認可，異

<sup>72</sup> 〔法〕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美〕華康德（Loic Wacquant）著，李猛、李康譯：《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頁133。

<sup>73</sup> 〔法〕布迪厄、〔美〕華康德著，李猛、李康譯：《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頁133、134。

<sup>74</sup> 〔美〕斯沃茨（David Swartz）著，陶東風譯：《文化與權力：布爾迪厄的社會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頁144。

端之言的奇說怪論才能在這一對舉中被定義出來，且產生異端向正統攀附競奪的可能。此外，正統之權力話語，也往往因異端存在而強化其合法形式的權威及控制權力。孫次舟、衛聚賢，乃至傅斯年、顧頡剛等人，除了知識場域的關係連結，其學術性格亦往往與自身社會地位及經濟條件連動，展示著各自執拗的身影。衛聚賢在〈中國近來研究古史的人〉一文中，曾把當時中國歷史學界分為數派，並對自我學術性格有所剖析：

中國近來研究古史的人，可分為四派……「一、議論平庸派」(即世代書香子弟，如陳漢章、柳翼謀之類)；「二、研究深刻派」(家庭貧寒子弟，常從小題目下手，而少大刀闊斧之作，如王靜安之流)；「三、破壞派」(反禮教，不滿家庭環境者，如胡適、顧頡剛等)；「四、建設派」(不滿於現狀的托古改制者流，如康有為、郭沫若)……我個人是窮家子弟，既不滿家庭，又不滿社會，因此我對於第二、第三和第四派都同意，但反對第一派。第一派的人，讀書廣博，很可作我的友誼顧問，是以我對於第一派，尚有相當友誼。<sup>75</sup>

衛聚賢出身寒微，也曾因生活所迫而多次失學，因此對學人有其愛憎交織之心理，然其猶能與世代書香子弟有所交誼，這樣的胸襟或許是急欲爭鋒、打倒權威，獲取學術乃至社會權力的孫次舟所不及。孫次舟曾為求職之事，周旋於顧頡剛、傅斯年之間，且其時已是顧、傅二人學術分途以後的事情。顧、傅雖然學術性格有所差異，但都看出孫次舟「狂」態及高傲脾氣，難以與人共處。顧頡剛還偶有對孫氏接濟，傅斯年則多所回絕。有趣的是，顧頡剛在 1942 年 6 月 7 日的日記中曾記錄一段話說道：「許多人都稱我為純粹學者，而不知我事業心之強烈更在求知欲之上，我一切所作所為，他人所毀所譽，必用事業心說明之，乃可以見其真相。」<sup>76</sup>若以顧頡剛此番自剖話語移轉到衛聚賢、孫次舟身上，或可視之為二人奇說怪論背後成因之正解。

<sup>75</sup> 衛聚賢：〈中國近來研究古史的人〉，《眾生》2：6（1939.2），頁 12。

<sup>76</sup>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 4 卷，頁 689。

## 徵引文獻

### 一、原典文獻

清·張自牧：〈瀛海論（中篇）〉，收入葛士濬編：《皇朝經世文續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

### 二、近人論著

《大公晚報·學宮彙報》第1版，1947年1月4日。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

王國維：〈古史新證·第一章總論〉，收入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11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頁239-243。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第7冊，瀋陽：遼瀋書社，1993。

\*孫次舟：〈評衛聚賢著古史研究因論孔子未作春秋〉，《圖書評論》2：5（1934.1），頁3-23。

孫次舟：〈漢琅邪相劉君神道石柱續考——駁朱希祖教授〉，《歷史與考古》3（1937.5），頁1-7。

孫次舟：〈漢琅邪相劉君神道石柱續考——續前〉，《歷史與考古》4（1937.6），頁8-16。

孫次舟：〈釋狄狄：敬質董作賓先生〉，《歷史與考古》4（1937.6），頁16-22。

孫次舟：〈論滕縣銅器羣之年代及邾國之起源〉，《益世報（昆明版）·史學第5期》第4版，1939年2月21日。

孫次舟：〈詩經豳風的產地及其歷史背景〉，《經世戰時特刊》38（1939.5），頁13-17。

孫次舟：〈詩經豳風的產地及其歷史背影〉，《經世戰時特刊》41-46（1939.9），頁43-54。

孫次舟：〈從蜀地神話中的蠶叢說到殯葬的蠶玉〉，《經世戰時特刊》47/48（1939.9），

頁 55-57。

孫次舟：〈左傳國語原非一書證〉，《責善半月刊》1：4（1940.5），頁 2-6。

孫次舟：〈左傳國語原非一書證（續）〉，《責善半月刊》1：6（1940.5），頁 7-10。

孫次舟：〈左傳國語原非一書證（續）〉，《責善半月刊》1：7（1940.6），頁 11-16。

孫次舟：〈「長沙古物聞見記」讀後記〉，《責善半月刊》1：11（1940.8），頁 15-18。

\* 孫次舟、顧頡剛、徐中舒：〈學術通訊：（二）關於骷髏作酒器的通訊〉，《責善半月刊》1：12（1940.8），頁 23。

孫次舟：〈司馬相如與卓文君〉，《責善半月刊》1：14（1940.10），頁 4-8。

孫次舟：〈讀「古蜀國為蠶國說」的獻疑〉，《齊魯學報》1（1941.1），頁 158-179。

孫次舟：〈史記商君列傳史料扶原〉，《史學季刊》1：2（1941.3），頁 78-97。

孫次舟：〈古蜀國之起源〉，《星期評論》22（1941.5），頁 3-5。

孫次舟：〈古蜀國之起源〉，《星期評論》23（1941.5），頁 9-11。

孫次舟、孔玉芳：〈關於銅器研究之基本事項〉，《責善半月刊》2：9（1941.7），頁 15-17。

孫江：〈拉克伯里「中國文明西來說」在東亞的傳布與文本之比較〉，《歷史研究》1（2010.2），頁 116-137。

張光直：〈《傅斯年、董作賓先生百歲紀念專刊》序〉，收入韓復智主編：《傅斯年、董作賓先生百歲紀念專刊》，臺北：中國上古秦漢學會，1995，頁 1-3。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7。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金明館叢稿二編》，臺北：里仁書局，1981，頁 247-249。

\*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1928.10），頁 3-10。

傅斯年：〈《城子崖》序〉，收入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 3 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頁 235-238。

\* 傅斯年：〈夷夏東西說〉，收入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 3 卷，長沙：湖南

教育出版社，2003，頁 181-232。

傅斯年：〈傅斯年致朱家驊、翁文灝、葉企孫（1942 年 4 月 29 日）〉，收入王汎森等主編：《傅斯年遺札》第 3 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頁 1254-1257。

傅斯年：〈傅斯年致孫次舟（1940 年 2 月 24 日）〉，收入王汎森等主編：《傅斯年遺札》第 2 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頁 1070-1071。

傅斯年：〈傅斯年致孫次舟（1942 年 12 月 16 日）〉，收入王汎森等主編：《傅斯年遺札》第 3 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頁 1369。

傅斯年：〈傅斯年致孫次舟（1942 年 4 月 30 日）〉，收入王汎森等主編：《傅斯年遺札》第 3 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頁 1257-1258。

傅斯年：〈傅斯年致孫次舟（1942 年 8 月 18 日）〉，收入王汎森等主編：《傅斯年遺札》第 3 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頁 1307。

聞一多：〈屈原問題：敬質孫次舟先生〉，《民主與科學》1：9/10（1945.10），頁 6-12。

潘光哲：〈張自牧論著考釋筭記——附論深化晚清思想史研究的一點思考〉，《新史學》11：4（2000.12），頁 105-121。

蔣觀雲：《中國人種考》，上海：華通書局，1929。

衛聚賢：《中國考古小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衛聚賢：《古史研究》第 2 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衛聚賢：〈中外文化接觸最早之期待〉，《中外文化》1：1（1937.2），頁 4-7。

\* 衛聚賢：〈中國文化起原於東南發達於西北的探討〉，《東方雜誌》34：7（1937.4），頁 147-157。

\* 衛聚賢、孫次舟：〈通訊一〉，《歷史與考古》3（1937.5），頁 21-23。

衛聚賢：〈中原民族之開發東北〉，《江蘇研究》3：5/6（1937.6），頁 1-7。

衛聚賢：〈離騷的作者——屈原與劉安〉，收入衛聚賢等：《楚詞研究》，上海：吳越史地研究會，1938，頁 1-19。

\* 衛聚賢：〈中國近來研究古史的人〉，《眾生》2：6（1939.2），頁12。

衛聚賢：〈扁鵲的醫術來自印度〉，《華西醫藥雜誌》2：1（1947.4），頁20-26。

衛聚賢：〈山海經中的醫藥〉，《華西醫藥雜誌》1：10（1947.10），頁20-24。

衛聚賢：〈扁鵲醫術來自印度的答辯〉，《華西醫藥雜誌》3：4-6（1948.9），頁8-9。

嚴復：《天演論·自序》，收入王栻主編：《嚴復集》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1319-1321。

顧頡剛、傅斯年：〈所務記載·造像徵集啟〉，《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1928.10），頁113-114。

\*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4卷，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

\* 〔法〕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美〕華康德（Loic Wacquant）著，李猛、李康譯：《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美〕斯沃茨（David Swartz）著，陶東風譯：《文化與權力：布爾迪厄的社會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德〕孔拉第（August Conrady）著，衛聚賢、李森合譯：〈戰國時中國所受的印度影響〉，《大學》1：3（1933.10），頁35-47。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Fu Ssu Nien, “Li Shi Yu Yan Yan Jiu Suo Gong Zuo Zhi Zhi Qu” [Working Purpose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i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1.1 (Oct. 1928), pp. 3-10.
- Fu Ssu Nien, “Yi Xia Dong Xi Shuo” [Theory of the Yi in the East and the Xia in the West] ad. in *Fu Sse Nien Quan Ji* [Complete Works of Fu Sse Nien] Vol.3 (Changsha: Hun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3), pp. 181-232.
- Gu Jie Gang, *Gu Jie Gang Ri Ji* [Gu Jie Gang’s Diary] Vol. 4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 Ltd., 2007).
- Pierre Bourdieu & Loic Wacquant, *Shi Jian Yu Fan Si-Fan Si She Hui Xue Dao Yin*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trans. by Li Meng & Li Kang,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1998).
- Sun Ci Zhou, “Ping Wei Ju-xian Zhu Gu Shi Yin Lun Kong Zi Wei Zuo Chun Qiu” [Comment on the Study of Ancient History by Wei Ju-xian on the Reason that Confucius did not Compose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n *The Book Review* 2.5 (Jan. 1934), pp. 3-23.
- Sun Ci Zhou, Gu Jie Gang & Xu Zhong Shu, “Xue Shu Tong Xun: (2) Guan Yu Ku Lu Zuo Jiu Qi De Tong Xun” [Academic Communication: (2) Communication on the Use of Skeletons as Wine Vessels] in *Zeshan Semimonthly* 1.2 (Aug. 1940), p. 23.
- Wang Fan Sen, *Gu Shi Bian Yun Dong De Xing Qi: Yi Ge Si Xiang Shi De Fen Xi* [A Rise of the Movement to Debates on Ancient History: An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Taipei: Asian Culture Publishing Co., Ltd., 1987).
- Wei Ju Xian, “Zhong Guo Wen Hua Qi Yuan Yu Dong Nan Fa Da Yu Xi Bei De Tan Tao” [Discussion of Chinese Culture Originated in the Southeast and Developed in the Northwest] i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34.7 (Apr. 1937), pp. 147-157.
- Wei Ju Xian & Sun Ci Zhou, “Tong Xun Yi” [Communication I] in *History and Archeology* 3 (May. 1937), pp. 21-23.
- Wei Ju Xian, “Zhong Guo Jin Lai Yan Jiu Gu Shi De Re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Researcher in Recent Years] in *Zhongsheng* 2.6 (Feb. 1939), p. 12.

